

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

李孝友

在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过程中，我们对云南省图书馆度藏的《径山藏》，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整理，通过查考有关资料，核对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所钞的《三藏圣教目录》，对这部《大藏经》的刊刻源流、所存卷数以及特点和价值，已初步弄清。这对研究我国佛教典籍和版刻印刷的历史，都是可以提供宝贵资料的。

《径山藏》的刊刻源流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以自己原是佛门弟子的原因，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曾在应天府（南京）蒋山召集僧众，校刻过《大藏经》，称为《南藏》；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又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由朝廷主持，在北京刊刻了又一部《大藏经》，后称《北藏》。万历年间，有个紫柏和尚，又名真可，由于感到明朝初年刊刻的《南藏》和《北藏》卷帙浩繁，不易携带，更不便于在民间流通，欲易梵笈为方册，乃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与憨山、幻予、幻居、如奇等和尚发愿重新刊刻《大藏经》，经过十年的准备工作，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

1589年)在山西五台山妙德庵开雕,刻了数百卷后,因这一带山区苦寒,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而且终年积雪,为怕浸坏版片,便迁移到浙江嘉兴径山寺,由寂照庵和兴圣万寿寺两个庙宇的僧众负责主持刊印工作,在嘉兴、金坛、吴兴等地刻版。当时云南姚安进士陶珽与其弟陶珙寓居浙江,和冯梦禎、陆光祖、袁黄等人均有往来,当紫柏、憨山和尚等发愿刊刻《大藏经》时,上述人曾大力支持倡导,陶氏弟兄不仅在经济上作了大量的支援,而且在刊刻过程中,还以《北藏》为底本,校对《南藏》,进行了一些校勘工作,得以竣事,进行开雕。到了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由于紫柏、憨山等和尚参与反矿税使的斗争,罹诬下狱,紫柏和尚被残害而死,没有能够看到这部《大藏经》的印行出版,就“弘法历难,卒于燕都”;憨山也被流放到儋耳(今海南岛)。《径山藏》的刊刻工作,此后便由紫柏的弟子法本,会同陶氏弟兄,“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艰巨出版工作的大部分。但是从此以后,将近四十年之久,时刊时停,进度非常缓慢,而且版片分散各地,没有全部汇集于径山。

到了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贵州赤水的继庆和尚(又名利根),是汉月、密云、雪峤等和尚的弟子,主动担负起继续刻经的任务,对已刻版数及未刻卷帙,一一加以调查、清点和记录,并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跑遍嘉兴、金坛和吴兴等地,纠工组织刊刻,并得到当时有名的刻书家、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的支持赞助,才完成了剩余部分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正藏”。这部《大藏经》基本刻成后,相应的订立了某些规则,如规定各地寺庙如需要这部《大藏经》的,都要到浙江嘉兴楞严寺接洽,拟行“请藏”的手续和仪式,因此当时都称之为《嘉兴藏》;到刊刻竣事,版片都汇集径山,收存和印刷也在这里,所以又称《径山

藏》。崇禎年間刻成“正藏”以後，歷經清代順治、康熙兩帝增補，又有“續藏”、“又續藏”的刊刻，直到康熙十六年前後，《徑山藏》才算全部刻成。

由於繼慶和尚與陶氏弟兄直接參與《徑山藏》的校勘刻印工作，這部《大藏經》刻成後，很快就流傳到西南地區。當“正藏”付梓印出，陶氏弟兄即運送《徑山藏》來雲南賓川的雞足山存放，每函書套里均附有一張刻印的陶氏函件，每冊書的封面上，都鈐蓋有記述陶氏送經的時間、經過和目的的紅色牌記。

陶氏送經來雲南以後，知空和尚在楚雄九台山新建大方廣寺，這座叢林巨剎落成，便派遣悉庵、宗燈二僧相繼到江南“請經”，《知空蘊語錄》中就載有《送悉庵江南請藏詩》：“吾家遠住在天邊，此去江南路萬千。三千靈文山岳大，五燈慧命一絲懸。洞庭渺渺天連水，黔國悠悠地接滇。將此身心奉塵刹，教興無碍祖師禪”。陳垣先生認為悉庵、宗燈二僧為九台山請的也是《徑山藏》。經過三百多年的輾轉遷徙，卷帙雖已不全，但雞足山和九台山的兩部《徑山藏》，終究歸並在一起，這就是雲南省圖書館皮藏有《徑山藏》的“正藏”和“續藏”的由來。

《徑山藏》的卷帙和版式

在歷代刊刻的《大藏經》中，一般都有目錄，後來曾收進《昭和法寶總目錄》中，而唯獨《徑山藏》卻沒有。在這次清理中，我們找到了清康熙五年所抄寫的《三藏聖教目錄》上下兩冊，便以此為依據，核對原經，清理結果，這部《大藏經》原有“正藏”二百一十函，收入藏內經典一千六百五十四種，六千九百五十六卷，一千四百六十冊，按《千字文》編號，始“天”終“碣”；原有“續藏”、“再續藏”九十函，收入藏內經典及藏外語錄及

杂著二百五十六种，一千六百零四卷，六百七十一册，没有《千字文》的编号。

《径山藏》的装帧为方册装，也就是线装，版式“正藏”和“续藏”不太统一。“正藏”版框高22.5厘米，宽15厘米，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四周双边，外粗里细，白口，书口上刻有经名、卷数、页码及《千字文》的字顺，但无刻工姓名，字体是整齐的老宋体字。“续藏”的版心行格与“正藏”不统一，有的版框高19厘米，宽11厘米，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单栏，白口；有的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双栏，黑口。此部《大藏经》后来流传到了日本，经过多方搜访汇集，收印在日本的《大正藏》里。

在“正藏”及“续藏”中，每本书都钤盖有“昙华禅林”的方形篆字印章及“悟禎”的长形篆字印章，前者是指云南大姚的昙华寺，后者是明末姚安土司高繇出家后的法名。卷末有的钤盖有“昙华山四义阁”的长形正楷印章一个；有的卷末钤盖有“陶珙”的长形印章，并有长方形红色书牌子一个，印有“南京工部郎中陶珙捐奉为荐显考奉直大夫陶公希皋姚宜人董氏宜福崇禎丙子中秋造”字样；有的卷首还有高繇的儿子“高裔映”的印章。

《径山藏》的特点和价值

对云南省图书馆度藏的这部《径山藏》，通过这次系统整理和初步鉴定，就我们现有的水平，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价值：

第一、《大藏经》的刊刻，从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张从信往益州雕版，刻成《开宝藏》后，历代都是敕雕官刻，特别是明代还设经厂负责，由太监专管，像《南藏》的版心就刻有“司礼监某某监制”的字样；皇帝亲自为之作序，像《北藏》

的“主”字号，就刻有《太宗文皇帝御制大藏经序》。但《径山藏》却一反过去的常规，而是由和尚主持、知识分子参与的私刻本。这不仅改变了封建统治阶级对“经”、“律”、“论”、“赞”出版的垄断，而且由于支持和参与的知识分子，像冯梦祯，陆光祖、袁黄及陶珽、陶珙等，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学、宗教、文字及版本知识，有的造诣还很深，因此在编辑和校勘《大藏经》上都相当精湛翔实。特别是陶氏弟兄，在编辑出版工作上就是有经验的，陶珽继陶宗仪编《说郛》之后，曾编纂并刊行过《续说郛》四十六卷，收入了有明一代的说部资料五百二十七种，尽管《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纪昀也曾批评说：“珽乃不别而漫收之，白苇黄茅，殊为冗滥”，但是这部丛书，在三百多年来，毕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正如陈恒先生指出的，“明人短书小说，反藉是以传，则篆刻之功未可没矣！”他们在协助紫柏和尚及其弟子法本刊刻《径山藏》中，又作过大量的编订和校勘工作，减少了讹误，同时还改进了装帧，可以这样说，《径山藏》的刊刻行世，是晚明出版事业上的一次改进和提高，是我国古代版刻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二、《径山藏》在内容上虽系佛教的经、律、论、赞等著述，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编辑刊印过程中，也冲破了传统宗教的藩篱，注意收集一些有关历史、哲学、笔记、文学及地方掌故等方面的资料，汇集入藏。像在历史方面，对四库史部中未收的一些传记如：《禅林僧宝传》、《布袋和尚传》；年谱如：《破山禅师年谱》、《赵州禅师行状》、《福严费隐禅师纪年录》等都收入了《径山藏》。尤其是一些很难找到的特殊性传记，像高道素手录的《乾明院罗汉尊号碑》，对寺庙中常见的五百阿罗汉的法名、简况，一一作了详细的记录，这对研究佛教史和雕塑艺术，都是比较重要的资料。其次像目录一类的书籍，在

《径山藏》中就收有《隋众经目录》十一卷，《武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三卷，《大圣教法宝标目》十卷，《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二卷，既是研究查考佛教的典籍，也是研究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工具书。

在哲学方面，《径山藏》中收入了释智旭的《周易详解》和憨山大师的《庄子内篇注》，虽然是以佛学的观点来解释《周易》和《庄子》，但并不像一般讲得那么晦涩难懂，大而无当，而是注解得平白明易，通俗易懂。如《庄子内篇注》中，对《逍遥游》里“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一章，就注解为：“资：卖也，宋人自以章甫为贵，而不知越人为无用也。此喻尧以天下为贵，特让许由，而不知许由无用天下，大似越人断发文身，以章甫为无用也。”其他章节也是注得言简意赅，这对研究讲授《庄子》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注本和必读的参考资料。

在笔记方面，像收集入藏的《干松笔记》、《清园百录》、《罗湖野录》、《见闻录》等都是传世较少的著作。释智旭的《见闻录》一卷，就是作者通过五十六则笔记，记载了江、浙、赣、闽等地区，有关佛教的轶事异闻，实际上有点类似《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一类的著述。释晓莹的《罗湖野录》二卷，是作者由于“畴昔出处丛林，其所闻见不为不多”，便将“得于尊宿提倡，朋友谈说，或得于断碑残碣，蠹简残编”的材料，荟萃成编，形成笔记式的著作，是研究当时佛教影响和社会状况的好资料。

在文学方面，《径山藏》收入了一些当时没有刊刻或不可能任意刊刻的诗文集，如《寒山诗》、《拟寒山诗》、《碧岩集》、《往生集》、《辟邪集》、《牧牛颂》、《净信堂初集》等。特别是《紫柏老人全集》十五卷，《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四十卷，不仅四库未收，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明代别集中的白眉，钱谦益在为

这部诗文集作序时评价说：“紫柏之文雄健而斩截，大师之文纤余而悲婉”。这样的评定是公允的，如紫柏和尚的一首七律《瀑布》：“谁家千尺素丝抽，高挂云端永不收。已悟源头来处远，肯将脚跟混常流。从他妙手应难剪，许我闲心分白头。此去定当归大海，待看波浪泼天浮。”和憨山和尚的一首五律《过山峡》：“万壑奔流下，千山紫翠连，帆飞三峡雨，人入九秋天。客路浮云外，归心落日前。吾生犹未已，江汉是余年。”不仅可以看出两人诗的风格各有特点，而且从诗的自然清新，抒情写景，都弥见佳趣，反映出这些别集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两部诗文集，都是由“毛子子晋，请独任镂版，以伸私淑之愿，子晋歿，三子褒、表、辰聿追先志，遂告成事”。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汲古阁刻版入藏的，在版刻价值上丝毫不容忽视。其次有的文集选得很有特点，如《长庆集》一卷，是将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与佛教有关的诗汇刻在一起，《宋文宪公护法录》九卷，是将明初宋濂所写有关佛教的诗文汇刻在一起，然后入藏，这与一般刻本《白氏长庆集》、《宋学士全集》比较，确实别具一格。再有像大园居士张有誉的《古今合响集》也是一部很别致的集子，收的多是七绝或长短句，从第一首到最末一首，都是以“妙湛颂”、“灵瑞颂”交替题名，内容则是一些写得较好的诗或词。如有一首《妙湛颂》写道：“江上琵琶月下听，寻常肝胆向谁倾，天涯自惜知音少，翻作当年怨别声。”在写作手法上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堪称佳作。此外像《诸佛菩萨名称歌曲》，则是很优美的佛曲专集，像卷二十三《善法界之曲》中有一首写道：“哎！最上乘，便是那百千众流，便是那百千众流，汪洋洋洋，滔滔汨汨，昼夜不息，无穷无尽，千支万脉，都赴着那大海沧瀛”。读了之后，给人一种“惟见长江天际流”的感受。像这样一些佛曲，可以说是研究明代宗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在

《径山藏》中，入藏的文学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在《绝余编》四卷中，就辑有楹联，有一副法堂楹联，上联是“古佛垂慈六度四弘同会极”，下联是“新罗示迹一花九叶别传灯”。不仅对仗工整，意境深远，而且佛家思想的气味也很浓郁。

在地方掌故方面，《径山藏》由于姚安陶氏弟兄的参与，在“续藏”里还收进了一些云南地方性的著述，如昆明释善坚的《古庭集》，释净伦的《竹宝集》，这两部书之刻入《径山藏》，就是由陶珽捐刻的，并有陶氏的序言，卷端题名为《曹溪一滴》，另外像《指空游记》还考证了昆明城垣的所在。这些云南僧人的著述，《滇南文略》和《滇系》均未收入，对研究云南地方、民族历史和文化，均有参考价值。

第三、《径山藏》由于刊刻的时间较长，卷帙浩繁，除“正藏”外，还有“续藏”，从内容上看，“续藏”还超过“正藏”；更具有学术资料价值。日本重印《大藏经》，之所以选择《径山藏》，看来是着眼于“续藏”部分。过去《大藏经》的研究者叶恭绰认为：《径山藏》除北京西山嘉兴寺藏有“正藏”和“续藏”外，在国内保存完整者已非常稀少。但云南省图书馆庋藏的这一部，不仅有二千五百三十七册（包括少数复本），而且“正藏”、“续藏”都有，虽不能像由云龙在《姚安县志》中所说“实为海内孤本”，但在国内现存的《径山藏》中，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重要的文物资料价值。



不墜矣。丞艸一疏唱導流通。毛子
子晉請獨任鑿版以伸其私淑之
願。子晉歿三子喪。夫屨聿追先志
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尋者
孝廉萬泰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
其仗助華首網羅散失者曹溪法

融海幢月池及華首侍者。今種今
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
附書上章。困敕之。旅仲冬。長至
日。海印白衣弟子虞山錢謙益焚
香稽首謹序。

钱谦益撰《憨山大師夢游全集序》書影

對這部《徑山藏》，目前雲南圖書館正組織技術力量修復，
並進一步搜訪流散，編出詳細目錄，以供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
研究參考。